

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名家书法

毛秋瑾 著

书法学术小丛书

— 01 —

毛秋瑾著

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名家书法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名家书法 / 毛秋瑾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7

（书法学术小丛书）

ISBN 978-7-5474-1310-4

I. ①敦… II. ①毛…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770号

本课题获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東畫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c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17毫米×182毫米

4.375印张 42幅图 35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书法/美术史

本丛书由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经费资助出版

学术顾问

华人德 白谦慎

策划

王学雷 张恨无

引言

敦煌和吐鲁番地处西北边陲，位于中西交通的要道，历史上多种文化在此汇聚、交融。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来看，汉文化始终是主流文化，中原王朝的统治也对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书法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竹木简牍、纸本墨迹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发掘品保存下来大量鲜活的书法史研究素材，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古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是如何进行书写的，习字范本有哪些，书艺水准怎么样。此外，从书法传播的角度来看，那些备受关注的名家书迹的拓本和临

摹本，更是说明诸如王羲之、智永、欧阳询、柳公权乃至唐太宗本人的书法流布之广，远播西北边疆。

收入本书的三篇文章，有着共同的主题，即研究的对象都和某位书法家有关，运用的材料则多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发现，因而将本书命名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名家书法”。

第一篇文章的写作缘起于应邀参加 2013 年 7 月在柳公权故乡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举行的“柳公权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选题时注意到关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金刚经》拓本存在争议，及至仔细比对，才发现这件赫赫有名的拓本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拙文主要从拓本缺字现象及书法风格两方面论证了这一碑拓为后人伪托之作。当然这件拓本发现于藏经洞这一点确凿无疑，但是柳公权（778—865）主要生活于八世纪晚期至九世纪上半叶，而藏经洞的封闭大约在十一世纪初叶，其间相隔 150 余年的时间。柳书在晚唐五代影响至巨，不能排除有人伪托其名义书碑刻石的可能性。

第二篇文章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年度学术课题的项目成果，主要整理了敦煌吐鲁番写本中与王羲之

书法有关的写本，探讨这些写本的书写年代、书写者身份、书体与书法风格等问题，揭示了这些写本的多重价值。

第三篇文章以唐代名将裴行俭的仕宦经历为着眼点，勾稽与裴行俭相关的唐初书坛的文献与图像资料，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选》写本，考察裴行俭的书法面貌及其在唐初书坛的地位与影响。写作灵感来源于饶宗颐教授为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所写的序言，其中就提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多种《文选》写本与裴行俭的关系。

上述三篇文章已分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中国书法家协会年度学术课题研究项目成果论文集》、《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发表，收入本书时略作修订。

有关“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名家书法”的课题，正是笔者近年关注的论题之一。这三篇小文仅是研究的开始，远未终结。如何将二十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非名家的书迹资料运用于书法史的研究，发掘有价值的议题，这也是笔者不断思考的问题。书迹形态当然是书法史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此外是否

还能找到更为宽广的研究面向也尤显重要，譬如书法传播与接受的途径、写本时代书籍的传抄与流布对书法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议题若能得到很好的探讨，书法史研究才能回应学术界关注的文化传播、写本学等热点问题，学者亦不致于固步自封、局限于书法研究本身。不少书法史学者已经在拓展议题、将书法史研究置于文化史研究的脉络中作出了成功的范例。笔者希望自己能在这一领域尽绵薄之力，亦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篇 敦煌本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 研究

一、史籍记载的柳公权书法及《金刚经》

碑拓 / 3

二、敦煌本《金刚经》拓本及相关研究 / 9

三、敦煌本《金刚经》拓本之我见 / 14

第二篇 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王羲之书法

一、《兰亭序》临本 / 29

二、《十七帖》临本 / 48

三、《宣示表》临本 / 67

四、《尚想黄绮帖》临本 / 75

第三篇 裴行俭与唐初书坛——兼及敦煌

吐鲁番本《文选》

一、裴行俭的仕宦与书法 / 89

二、存世的唐代《文选》写本及其与裴行俭
书法的关联 / 99

三、裴行俭对唐初书坛的影响 / 121

后记 / 129

第一篇

敦煌本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研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ren.com

敦煌藏经洞发现有三种唐碑的拓本，分别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书《温泉铭》拓本、贞观五年（631）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拓本（P.4510+S.5791）及长庆四年（824）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P.4503）。在这三种碑拓中，《金刚经》拓本是唯一完整的一种，然而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一种，学者们对于这一拓本原石是否为柳公权所书有不同意见。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及学者们的论述对敦煌所出《金刚经》拓本展开研究，论证其为后人伪托之作。

一、史籍记载的柳公权书法及 《金刚经》碑拓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根据史籍记载，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作辞作赋。元和初年中进士，初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为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初年是公元806年，此时柳公权29岁。他在青壮年时就以书法闻名。《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

员外郎。”^[1]

唐穆宗即位是公元 820 年，此时柳公权 43 岁，正值壮年。在此之前，佛寺中就能见到他的书迹，可知他的书法在宪宗朝就为世人认可。

柳公权在唐穆宗（820—824 年在位）、敬宗（824—826 年在位）、文宗（827—840 年在位）三朝都担任宫中的侍书学士。他在穆宗朝有“心正笔正”之谏，后世传为美谈。唐文宗更是推崇他的诗文和书法，曾命他将诗句题写在宫殿的墙壁上，每字方圆五寸，文宗看了以后赞叹说连钟繇、王羲之再生也超不过他。唐宣宗（847—859 年在位）继位后，升他为少师，柳公权进宫答谢，宣宗召他上殿，让他当面书写三幅字，军容使西门季玄替他捧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替他过笔。一幅写的是正楷十个字，“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幅是行书十一个字，“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幅是草书八个字，“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赏赐给他锦缎、瓶

[1] 参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柳公绰 / 弟公权”。

盘等银器，并命令他亲自书写答谢表，不拘楷书、行书，宣宗对他的谢表，特别珍惜。^[1]

两唐书中记载柳公权最初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又广泛浏览学习近世书家的笔迹，形成自己遒劲而妩媚的书风。他的书法既取法于魏晋，又受到初唐盛唐书家的影响，自成一家。柳公权所书写的《金刚经》，更是煊赫名迹。两唐书中均记载长安西明寺的《金刚经》为柳公权所书，兼收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人的笔法，是他的得意之作。^[2]且《旧唐书》中明确指明为《金刚经碑》，因而这是他本传中唯一提到的碑版作品，应当是他在世时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品之一。有关柳书《金刚经》的著录较多，下文列举几例。

宋代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卷十有两条关于柳公权书《金刚经》的记载，一为第

[1] 参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柳公绰／弟公权”。

[2] 参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柳公绰／弟公权”及《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列传第八十八“柳公绰／弟公权”。

一千八百六十六条：“《唐金刚经》，柳公权正书，会昌四年（844）四月。”一为第一千九百九条：“《唐西明寺金刚经》，柳公权正书，大中十三年（859）六月。”^[1]

宋代董逌[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北宋政和（1111—1117）至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所著《广川书跋》卷八《金刚经》条云：“此经本书于西明寺，后亦屡改矣。经石幸存，不坠兵火。柳玭谓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2]柳玭是柳公权兄长柳公绰的孙子。这条记载说明西明寺的《金刚经》经过屡次变动（大概指石碑位置的变动），但并未毁于战火，在南、北宋之际尚存。

南宋佚名作者编纂的《宝刻类编》卷四记有柳公权书迹共七十六件，其中《金刚经》有两件，其一为郑口题额、会昌四年（844）四月书，其二为

[1]（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正《金石录校正》，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197页、200页。

[2]（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八页十七，收入〔明〕毛晋辑《津逮秘书》第21册，台北：艺文出版社，1966年。

安国寺模西明寺《金刚经》、大中十三年（859）六月书。两种碑石均保存在京兆长安。^[1]上述记载说明柳公权书写的《金刚经》碑石不止一处，南宋时西明寺《金刚经》已经不存，只存有安国寺的模刻。西明寺的《金刚经》为煊赫名迹，若是存世，《宝刻类编》的作者不可能不记录。

明代于奕正（1594—1636）《天下金石志》记载柳公权的两种《金刚经》：“（1）《褒禅寺金刚经》在鄞县；（2）《兴唐寺金刚经》，郑虔题额，在咸阳。”^[2]第一种在浙江鄞县，可能根据柳书翻刻，也有可能是后人伪托。第二种记为“郑虔题额”，郑虔（691—759）在柳公权出生以前就已去世，应是后人根据《宝刻类编》的记载而作的附会，碑石恐亦是翻刻或伪托柳书之作。

[1] 参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粤雅堂丛书本《宝刻类编八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两条记载见1—737下栏及1—738上栏。

[2]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十五卷附寻一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8册》，齐鲁书社，另转引自陈龙海：《柳公权书碑系年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2期，2000年3月，114—120页。